夏巾帼．粮价下跌与“谁来种地”——基于洞庭湖平原Y镇的经验分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1）：106-115.
XIA Jinguo. Falling food prices and "who will farm"——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Y town in Dongting Lake Plain［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3，22（1）：106-115.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3.01.012

粮价下跌与“谁来种地”

——基于洞庭湖平原Y镇的经验分析

夏巾帼
（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粮价下跌对农业种植主体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促进农业转型。研究发现，劳动力非农转移背景下农村社会普遍形成“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结构，老人和“中农”是主要的农业种植主体。粮价下跌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要投入的老人和“中农”无法实现劳动力变现的预期，老人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种植，“中农”退出农业生产，“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问题。而基于家庭劳动力和资本双投入的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规模，具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因而这类农场顺势接手老人和“中农”退出的土地。进而，粮价下跌促使农业生产由“老人农业＋中农农业”向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转型。

关键词：粮价；老人农业；中农农业；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农业转型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3）01-0106-1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正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人口大国，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战略问题。饭碗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粮食安全的保证与农业种植主体息息相关，也就是说，“谁来种地”这一问题事关粮食安全。因此，对“谁来种地”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于“谁来种地”的讨论由来已久，该讨论产生于两大背景。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和老龄化趋势明显[1]，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依靠其难以维持[2]，且农业生产兼业化、副业化明显[3]，同时农村土地抛荒现象日益严重，这些现实困境引发讨论。另一方面，农业问题一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因此，政府积极主动地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这也引发“谁来种地”的讨论。

关于“谁来种地”，基于“列宁－恰亚诺夫”之争，即资本主义规模化经营与家庭组织小农经营，何者是未来农业种植的主体，学界主要形成两种观点。

其一，工商资本种地。该观点认为，土地抛荒引发的“无人种地”隐忧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皆要求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4]。在西方发展主义话语霸权下，小农经营被认为是落后的，规模化和商品化才是农业的发展模式[5]。这种“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主张消灭传统农业和构成传统农业基础的‘小农经济’，重新构造农业经营基本组织方式，将小农经济转变为由资本主导的规模经营”[6]。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地方政府鼓励资本下乡，按照现代农业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目标培育农业经营主体[7]。

其二，小农家庭经营。该观点认为，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有生命的植物为劳动对象的生产过程并不适合大规模、工厂化的劳动组

收稿日期：2022-02-25 **修回日期：**2022-03-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精英流失及其应对机制构建研究”（19CSH007）
作者简介：夏巾帼，研究方向：基层治理，农村社会学。

织方式[8]，“需要大量人力的投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精细化耕作和节点式管理”[9]，这些农业生产特点决定了只有家庭经营才能保证农业生产效率[10]，且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农场规模与生产效率之间呈反向关系[11]。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背景下，农村自发形成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具有较强合理性的“小农＋中农”农业经营格局[12]，其中“小农”经营以“老人农业”为表征，“中农”经营则以土地自发流转形成一定的耕种面积为基础，但“中农”从本质上仍属于小农范畴，其经营模式与一般农户没有区别[13]。有学者认为中国并非农业大国，而是小农国家，农业问题是三农问题[14]，不能只看效率一个指标[15]，从而“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应当是小农经济的现代化之路”，农业现代化与小农经济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6]，且现阶段小农户的生产过程已经植入现代农业的某些基因[16]。因此，“老人农业＋中农农业”是一个相当稳定而有效率的中国式小农经济结构[13]。

上述两种观点主要从生产环节对“谁来种地”进行讨论。工商资本种地强调通过利用机械生产和科学技术来改造农业生产环节，进行规模革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17]，而小农家庭经营则认为农业生产的特点使得以家庭为单位实施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现象[18]。这些讨论是非常有益的。然而，在中国粮食生产已经高度商品化的情况下，仅从生产环节对“谁来种地”进行讨论是不够的，这些讨论忽视流通环节即粮价对“谁来种地”问题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力图从粮价这一角度对“谁来种地”问题展开回答。调研表明，粮价这一宏观因素深刻地影响着农业种植主体的行为选择。粮价下跌使得“老人农业”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种植，“中农”退出种植，而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得以兴起。从而，粮价下跌使得农业生产从“老人农业＋中农农业”向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转型。

笔者于2019年7月5日至25日在洞庭湖平原Y镇开展为期20天的田野调查，期间围绕农业生产等问题进行集中考察，访谈该镇农业站站长、村干部、村民小组长、种植大户、普通村民等对象。Y镇是中部小县城辖下的普通农业型乡镇，下辖12个行政村和3个社区，面积78平方公里，人口4.7万人，以丘陵地形为主，耕地面积2980公顷，农业是主导产业，主要种植水稻。分田到户时，Y镇将耕地划分为三类，即山林、旱地和水田，旱地、水田皆人均约0.05公顷，但由于旱地种植条件较差，村民陆续抛荒，现阶段村民主要耕种水田。在2018年之前，打工经济的兴起和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得Y镇的农业种植形成了“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的结构，老人和“中农”是主要的农业种植主体，这也是中西部地区大多数普通农业型乡镇的状况。自2018年始，水稻价格大幅度下降，影响Y镇农业种植主体的行为选择。一方面，老人退出种植或退守至“口粮田”，“中农”退出种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开始出现。因此，Y镇作为研究主题的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二、“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结构的形成

中国农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沿海和城郊农村为典型的资源和财富比较密集的农村地区，在这些农村地区，大部分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其收入来源于务工、经商，甚至是土地和房屋租金，但这些农村仅占中国农村的5%；一类是广大中西部地区普通农村，其城镇化率较低，大部分土地仍用于农业生产，农民家庭形成“半工半耕”的职业格局和收入结构，这部分农村是中国农村的主体，约占95%[19]。本研究所探讨的主题便是发生在这95%的普通农村地区。

为了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地区推行。分田到户时，由于人多地少的客观境况，农村形成“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经营规模，且为了保证分田的公平性，农民按照土地的用途（山林、旱地、水田等）、远近距离、肥沃程度等标准划分土地，导致地块细碎化严重。这一时期，土地是农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都投入到土地上，农村地区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形态。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非农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农民家庭开始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配置家庭劳动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进工业部门，从而在村庄逐渐形成关于农业生产的两种

分工。其一，农民家庭内部的分工，即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20]，由家庭中的老人来承担“半耕”[21]部分，这便形成“老人农业”；其二，村庄内部的分工，即有些农民举家外出，而有些青壮年农民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外出（比如家中有高龄老人、年幼小孩需要照料），通过土地的自发流转，无法外出的青壮年农民获得那些“无人耕种”的土地，从而能够通过农业生产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22]，这便形成“中农农业”。因此，广大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形成“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的农业经营形态，老人和“中农”是农业种植主体。

以Y镇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青壮年农民开始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农民家庭逐渐形成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即妻子在家照顾家庭、种地，丈夫外出务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旱涝灾害频发，且农业税费负担较重，年轻妇女也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农民家庭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即年老的父母在家种田、带孙子，年轻子代则外出务工。现在常年在村的主要是老人及少数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外出务工的中青年人。据一位小组长介绍，该小组绝大多数农民都已外出务工，根据2018年的统计，该小组有164人，常年在村的农民却只有26人，其中80岁以上有7人，70～80岁有6人，60～70岁有4人，还有5个小孩。在村的老人和少数中青年人皆从事农业生产，以水稻种植为主，把农业生产当作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他们是主要的农业劳动力。老人主要种植自家的承包地，一般不超过0.67公顷，而中青年人除了种自家的承包地外，还会种周边村民不要的土地或低价流转土地进行耕种。

（一）“老人农业”

“老人农业”主要是指中老年人为经营主体的农业。“老人农业”中的“老人”并非生理年龄（60周岁以上）意义上的老人，其定义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一，家庭生命周期，即“老人农业”中的“老人”或是已经完成人生任务（子女已成家），成为负担不重的人，从而处于退养状态，或是帮子女带小孩，无法外出务工；其二，劳动力市场，即“老人农业”中的“老人”一般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位置，且逐渐被劳动力市场淘汰，由于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务农便成为一种选择。在家庭生命周期和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老人农业”中的“老人”在生理年龄上一般呈现为50岁以上。

“老人农业”一般耕种自家的承包地，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自雇为主。“老人农业”没有经营的雄心，主要是退养的逻辑，具有两个特点，其一，以种植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为主，因为大宗农产品价格稳定且生产技术成熟，种植风险较小；其二，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的，收获有余才会拿去市场上售卖[21]。

“老人农业”一度被认为是农业产业走向夕阳化的象征[1]。然而，随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及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老龄化并不会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23]，单独留守在村的老人、妇女也能顺利地完成整个农业生产活动[24]。从而，“老人农业”在中长期内大量存在成为可能[25]。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Y镇青壮年劳动力便开始外出务工，相对于全国其他农村地区而言，Y镇农民外出务工时间较早。从而，Y镇家庭劳动力配置较早实现由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转型，因此，“老人农业”较早成为Y镇农业生产的常态。

案例1：Y镇村民C某，54岁，家有8口人，即丈夫、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以及两个孙子，大儿子32岁，育有一子5岁，小儿子30岁，育有一子3岁。儿子儿媳皆在广东务工，两个孙子则由C某夫妻俩抚养。C某夫妻于2001年开始外出务工，丈夫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妻子做环卫工人，两个儿子则由C某的婆婆照料。为了给儿子建婚房，夫妻俩于2012年回村。两个儿子陆续结婚并有了小孩，为了照顾孙子，C某夫妻决定暂不外出务工。由于儿子、媳妇的收入水平有限，孙子的日常开支皆由C某夫妻俩负担。为了维持生活，C某夫妻种田0.33公顷，养了十几头猪，丈夫还在附近做建筑零工。

（二）“中农农业”

“中农农业”主要是指由“中农”作为经营主体的农业。有学者强调“中农”的阶层属性[26]

和社会属性[22]，但本研究强调农业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农”，即经营中等种植规模的农民。“中农”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方面呈现出一些特征：其一，基于村社内部互惠体系的土地流转。互惠使得土地流转租金成本较少甚至没有，但也使得土地流转的范围难以超过自然村的界限；其二，小规模的机械投入。“中农”的耕种规模使得大型农业机械的投资既不划算，也不必要；其三，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中农”家庭形成夫妻分工，丈夫承担主要的农业劳动，妻子则以家务劳动为主，在家做饭、收拾家务、喂养家禽等[27]。

“中农农业”耕种的土地规模超出自家承包地，但也受限于互惠圈子的范围以及家庭劳动力的承载能力，且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自雇为主，农忙时偶有极少量雇工，还有小规模农业器械的投入。家庭劳动力的投入是“中农农业”的核心，从而“中农”一般是在村的青壮年或者劳动能力强劲的中年甚至低龄老人。农业收入是“中农”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中农农业”具有三个特点：其一，生产面向市场，即农产品（农业型地区以粮食作物为主）主要拿到市场上售卖，以实现变现；其二，农业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即通过农业生产，家庭劳动力的变现能够维持家庭在村庄中的中等收入地位；其三，以家计生产为目的，即农业剩余主要用于家庭消费，而不是扩大再生产[27]。

案例2：Y镇村民X某，1957年生，从未外出务工，依靠种地和在周边做建筑工为生，是一位典型的中农。其典型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土地的获得基于村社内部的互惠体系。2013－2016年，X某的种植规模达9.33公顷，其中本小组的水田有8.00～8.67公顷，邻组的水田有0.67～1.33公顷，都是一些“无人耕种”的土地，无需支付租金。其二，小规模机械的投入。为了便于耕作，X某购买两台小型打田机，约2000元/台，在农忙时还雇佣1位临时工，同时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来处理收割环节。其三，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X某主要负责农业生产，其妻子主要负责洗衣、做饭等家务，还喂养一些家禽。X某种田比较精细，产量较高，每季能达5250～6000公斤/公顷。且X某种田的这几年，粮价可观，稻谷七成干也能卖到130多元/百斤，每公顷纯收入有9000多元。除去生产成本，种粮的纯收入有60 000多元。同时，X某在农闲时还做建筑工，每年还能收入10 000多元。种粮加上打零工的收入，X某每年收入70 000～80 000元，经济收入属于本村的中上层。

“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的农业经营结构是广大中西部农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实现了小农经济的自我完善和升级[27]，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小农经济[28]。这一农业经营结构于农民家庭、村庄社会以及国家粮食安全皆具有重要意义。

三、粮价下跌与“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结构的瓦解

人均农业自然资源稀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目前中国仍有约1.9亿户农民家庭经营耕地[15]，这决定了小规模家庭经营仍占据主导地位，“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的结构具有稳定性，老人和“中农”仍是主要的农业种植主体。然而，笔者在Y镇的调研表明，粮价下跌瓦解这一农业经营结构，“老人农业”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种植，“中农农业”则退出种植。

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中国的粮价并非完全由市场规律决定，而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上实行宏观调控，由国家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表1呈现2010－2022年的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数据表明，2010－2014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不断上涨，2015－2017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稳定在2014年的“峰值”，2018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大幅度下降，该收购标准持续至今。由于农户一般是将粮食卖给粮贩子，粮贩子要扣除水分、含杂率等成本以及利润率，因此，粮贩子收购粮食的价格一般低于国家最低收购价格。Y镇村民深刻地感受到粮价下跌，2017年及以前，水稻价格稳定在120～130元/50公斤，且稻谷七成干即可，粮贩子上门收取。而2018年水稻价格下跌至105元/50公斤，2019年甚至下跌至100元/50公斤，且稻谷要求十成干，农户自己拉去米厂出售。根据当地村民提供的信息进行计算，Y镇处于亚热带地区，粮食作物种植可一年

一季，即中稻（米质相对较好），也可一年两季，即早稻和晚稻。正常年份，中稻每公顷产值约9000公斤，早稻、晚稻每公顷产值皆为5250～6000公斤。当粮价从130元/50公斤下跌至100元/50公斤，中稻每公顷收入将减少5400元，早稻、晚稻每公顷收入将减少3150～3600元。粮价下跌减少种粮农户的收入，影响种粮积极性[29]。

表1 2010－2022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

单位：元/50公斤

年份	早籼稻	中晚籼稻	粳稻
2010	93	97	105
2011	102	107	128
2012	120	125	128
2013	132	135	150
2014	135	138	155
2015	135	138	155
2016	133	138	155
2017	130	136	150
2018	120	126	130
2019	120	126	130
2020	121	127	130
2021	122	128	130
2022	124	129	131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的数据

（一）“老人农业”：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种植

粮价下跌使得Y镇的老人没有种田的积极性，除种植自给自足的“口粮田”外，纷纷处置“多余”的土地，或是流转给种田大户，或是撂荒。有的老人甚至把所有土地都流转出去，拿着土地租金买粮吃，因为“种田不划算了”。粮价下跌开始对“老人农业”的生产积极性产生实质性影响，即老人采取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种植的应对策略。这与老人开始强调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变现能力密切相关，即老人开始进行理性计算，考虑种地的成本投入（主要是劳动力）与产出。而在以前，老人强调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变现本身，即重要的是劳动力可以通过农业生产变现，变现的多少反而没那么重要。为了提高产量，老人一般会不计成本地投入。因此，粮价下跌并未从实质上影响“老人农业”的生产积极性。

老人开始强调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变现能力，其关键在于劳动力的商品化，即劳动力明码标价，这为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变现能力提供参照对象。当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变现能力大于或等于其他可获取的劳动力变现途径时，劳动力选择农业生产，反之则选择其他可获取的劳动力变现途径。粮价下跌必然损害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变现能力。据村民介绍，在粮价下跌之前，中稻每公顷纯收入有9000～10 500元，早稻、晚稻每公顷纯收入6000～7500元，两季每公顷纯收入12 000～13 500元。而一些生产环节实现社会化服务后，每公顷只需投入45～60个工（一个工作日的劳动力）。因此，老人通过粮食种植实现劳动力变现的单价为，中稻约200元/工，早稻、晚稻约150元/工。当地仍有一些非正规就业机会，如建筑工，稍有些技术含量的大工（泥瓦匠等）工资为200元/天，没有技术含量的小工工资为100元/天。老人通过粮食种植实现的劳动力变现能力与通过非农就业机会实现的劳动力变现能力相当，从而，老人尚有种田的积极性。但随着粮价的下跌，中稻每公顷纯收入只有6000多元，早稻每公顷纯收入3000多元，晚稻每公顷纯收入4500多元，老人种地的劳动力变现单价为，中稻100元多一点点/工，早稻、晚稻还要更低，“算盘一打，就没有了种田的积极性”。

许多老人仍保留“口粮田”，其关键在于“老人农业”是一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具有生产性、保障性、休闲性和价值性。粮价下跌虽然消解“老人农业”的生产性意义，即强调“老人农业”作为老人劳动力变现的一种方式，但并没有消解“老人农业”的保障性、休闲性和价值性意义。通过种植“口粮田”，老人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减少货币化开支，这是“老人农业”的保障性意义；通过种植“口粮田”，老人体验属于农民独有的休闲娱乐，这是“老人农业”的休闲性意义；通过种植“口粮田”，老人觉得自己并非是“混吃等死”的家庭负累，这是“老人农业”的价值性意义。“口粮田”的种植并非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因而无需考虑劳动力变现的问题，也无需考虑投入－产出的效益问题。

粮价下跌使得“老人农业”开始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老人开始放弃除自给自足之外的那部分土地，因为这部分土地的产出具有生产

性意义，是要销售到市场的。销售的部分不同于自给自足的部分，销售的部分必然要考虑投入—产出效应，考虑劳动力的变现能力。当销售部分的劳动力变现能力低于其他可获取的劳动力变现途径时，劳动力必然会放弃产出销售部分粮食的土地。

（二）“中农农业”：退出种植

不同于农业产出主要用来自给自足的“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的产出主要面向市场销售。不同于作为家庭补充性收入的“老人农业”，“中农农业”是“中农”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且通过“中农农业”，“中农”家庭能够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维持家庭在村庄中的中等收入地位。这表明，一方面，“中农农业”深受市场价格规律的影响，粮价的波动直接影响“中农农业”的收益；另一方面，“中农农业”实际上是农民在村庄中寻找到的劳动力变现机会，“中农农业”的资本投入非常少（以中小型农业机械为主），以家庭劳动力的自我剥削式投入为主[30]，因此“中农农业”赚取的是家庭劳动力的变现。且这一机会带来的劳动力变现能力不能低于外出务工的机会。当粮价下跌使得“中农”的劳动力变现能力不及外出务工而无法维持家庭在村庄的中等收入地位时，“中农”便会果断退出农业种植，寻找其他经济机会。

据Y镇农业站站长介绍，粮价“红火”的那几年，该乡镇种植规模在几十亩到一百亩之间的“中农”有50多户，他们一般是在“兄弟组”之间自发流转，土地租金低，还有6户是流动性家庭农场，即“外地包地农”[31]，种植规模在13.33公顷左右，土地租金为3000～4500元/公顷/年。然而，粮价下跌后，“中农”逐渐消失，一些流动性家庭农场也走了。Y镇农机社会化服务提供者J某据他的观察进行介绍，粮价下跌之前，Y镇有较多种植2～3.33公顷粮食作物的“中农”。然而，随着2018年以来的粮价下跌，“中农”逐渐退出粮食种植，开始谋求其他生路，2019年则基本上不存在“中农”。“中农”为何消失？因为粮食种植是“中农”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粮价下跌使得“中农”觉得种地不划算。假定一个“中农”种了2.33公顷水稻，种一季中稻，产值按7500公斤/公顷来算，粮价下跌（从130元/50公斤下降到100元/50公斤）后，每公顷至少损失4500元收入，2.33公顷则少了近万元的收入，这是“中农”家庭收入的巨大损失。依靠种地，“中农”劳动力的变现能力不及外出务工，甚至农业收入无法维持其在村中等收入水平的生活。

“老人农业”和“中农农业”都将农业种植视为劳动力变现的手段，赚取的都是劳动力报酬。当粮价下跌使得农业种植这一劳动力变现手段的变现能力受损且不及其他可获取的劳动力变现手段的变现能力时，“老人农业”与“中农农业”皆会退出农业种植。

四、谁来种地：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

由于粮价下跌，中西部农业型村庄自发形成的“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的农业经营结构被瓦解。“老人农业”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种植，“中农农业”退出种植。那么，谁来种退出的田？Y镇的实践表现为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出现。

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这一农业经营形态既具有家庭农场的特点，又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生产的特质。国内学者尚未形成关于家庭农场定义的统一观点，但对家庭农场的特点有一定的共识，如家庭经营、适度规模、市场导向、专业生产、家庭劳动力等[32]。一般认为，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而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资本主义生产特质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单位土地的资本投入不断增加，中国农业发生实质性的资本化[33]；其二，获得利润以扩大再生产而非完成简单再生产以维持生存是生产资料的使用目的[34]，“积累是否用于扩大再生产，是资本农业区别于小农农业的重要变量”[31]。由此，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界定：“第一，通过支付流转费形成一定的土地规模，并购置大中型农用机械，形成单位面积上的高资本投入；第二，以自身的家庭劳动力为主，兼用生产性的短期雇工；第三，以家庭为核算单位，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第四，通过资本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

以期达到利润最大化的规模”[35]。

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与小农家庭经营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相同之处在于，皆以家庭为核算单位，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不同之处在于，小农家庭经营以家庭劳动力投入为主，而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不仅有家庭劳动力的投入，而且有数量可观的资本投入，是家庭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的合体。且小农家庭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简单再生产以维持生存，而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则是为了获取利润最大化以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农业同样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相同之处在于，皆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以扩大再生产为目的，皆注重资本投入。不同之处在于，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以家庭为核算单位，且家庭劳动力投入并重，而资本主义农业则以大规模农业企业为核算单位，且以个体化的农业雇工为主[33]。这种“‘既非小农，也非成熟的资本家’的混合特征，实际上只是小农走上‘资产化’道路的一个表征。其代表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正在转变中的、中间或过渡状态的生产方式；它虽然披有‘家庭经营’的外衣，但其内在经营实质已经不同于小农农业；同样，虽然其经营具有农业企业的性质，但其日常经营中仍旧是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所以它还不能被算作是完全意义上的资本化农业”[36]。

在粮价下跌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缘何愿意接手“老人农业”和“中农农业”退出的土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包含两个方面。其一，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为何没有因为粮价下跌而退出农业种植？“老人农业”和“中农农业”的退出是因为它们以家庭劳动力作为主要投入，种地的规模以家庭劳动力承载能力为基础，赚取的是劳动报酬，而粮价大幅下跌使得劳动力变现能力受损，种地变得不划算，从而退出种植。而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是家庭劳动力和资本（大型农业机械等）的双投入，赚取的是劳动力报酬和资本投入的利润。其经营包括两部分，一是农业种植，二是在充分实现资产效益最大化的驱动下供给农业生产性服务[25]。对于前者，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以家庭劳动力和农业机械的承载能力为基础，一般经营规模较大，而土地经营规模对生产成本有显著的负面影响[37]，因此，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单位产量的生产成本要低于“老人农业”和“中农农业”。对于后者，供给生产性服务是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除农业种植以外的另一收入来源。从而，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具有更强地应对粮价下跌的能力。其二，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在粮价下跌的背景下为何继续扩大种植规模？这与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资本主义生产特质密切相关，即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具有资本的扩张性，通过资本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以期达到利润最大化的规模。

案例3：Y镇村民J某便是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经营者。J某36岁，父子俩一起种田，父亲67岁，身强体壮。2019年经营面积达33.33公顷，同时提供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J某于2015年开始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行业，即为种田提供机械化服务，主要包括耕田、收割两个生产环节。他投资了大型农用机械，包括旋耕机1台，100 000元/台，政府补贴20 000元/台，收割机1台，120 000元/台，拖拉机1台，7000～8000元，主要负责给周围3～4个村子的农民提供机械化服务。2016年，J某扩大投资规模，分别投资一台旋耕机和一台收割机，2018年，又添置一台收割机。同时，2016年，J某开始种水稻，刚开始只种了6.67公顷，租金3900元/公顷，2017年，扩展至12公顷，2018年扩展至20公顷，因为粮价下跌，租金下降至3000元/公顷，2019年，J某种植面积扩展至33.33公顷，租金则降至2250元/公顷。J某扩展的种植面积主要来自两部分群体，一部分是“中农”，粮价大幅度下跌使得他们不想种地，J某便接管过来；一部分是老人，粮价下跌后，他们把除“口粮田”之外的土地甚至全部土地流转给J某。就收入而言，2018年，J某社会化服务的纯收入包括打田70 000～80 000元，收割70 000～80 000元，种田纯收入100 000多元，共有近300 000的纯收入。

粮价下跌意味着粮食种植这一劳动力变现途径的变现能力下降，当粮价下跌的幅度使得粮食种植的劳动力变现能力不及其他可获得的劳动力变现途径时，劳动力便会退出粮食种植。因此，粮价下跌促使开始强调粮食种植的劳动力变现能力的老人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种植，也促使以粮食种植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中农”退

出种植。由此，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在劳动力非农转移背景下形成的“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结构被瓦解。“老人农业”和“中农农业”退出的土地则由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接手，这是因为，一方面，相较于“老人农业”和“中农农业”而言，基于家庭劳动力和资本双投入的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在收益和生产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而具有更强的抵御粮价下跌的能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资本主义生产特质使其不断扩大再生产以达致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规模。由此，广大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农业生产由“老人农业＋中农农业”向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转型。

五、结论与讨论

粮价下跌对农业种植主体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促进农业转型。当前老人和“中农”是主要的农业种植主体，粮价下跌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要投入的老人和“中农”无法实现劳动力变现的预期，从而“老人农业”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种植，“中农农业”退出种植，“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问题。而基于家庭劳动力和资本双投入的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规模，本身具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从而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接手老人和“中农”退出的土地。因此，粮价下跌促使农业生产由“老人农业＋中农农业”向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转型。

然而，粮价是波动的，有下跌亦有上升，当粮价上升时，退出种植的“老人农业”和“中农农业”是否得以复归，从而瓦解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中国的粮价并非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决定，政府在粮食定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粮价一般而言较为稳定，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因此，粮食种植这一劳动力变现途径的变现能力是有限且稳定的。从而，对于“老人农业”而言，由于农业收入只是家庭收入的补充且种植规模较小（以自家承包地为主），因而粮价上涨的经济效益非常有限，“老人农业”重新开始（收回退出的土地）的可能性不大。对于“中农农业”而言，由于农业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粮价上涨使其有动力重新开始。但“中农农业”必须要流转土地才能达成一定的种植规模，而与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相比，“中农农业”在流转土地方面不具有优势。因此，“中农农业”也难以重新开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一旦占据这些退出的土地，在粮价上涨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的本质使其也不可能轻易退出。

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兼具工商资本种地和小农家庭经营的优点，同时克服两者的缺点，也许会成为当前农业转型的发展方向。

一方面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像工商资本种地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却因以家庭劳动力作为主要的可变资本投入而具有工商资本种地所不具有的优势。工商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一般不愿意种植只能获取平均利润的粮食作物，非粮化趋势明显[38]，更多地选择具有获得超额利润可能性的经济作物，甚至打着“种地”的旗号发展一、三产结合，这违背引进工商资本种地的初衷。若工商资本选择种植粮食作物，其土地生产率却不及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粮食作物种植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需要精细管理。工商资本种地以从劳动力市场雇佣工人为主，对劳动力的管理决定了土地生产率。然而，在实践中，管理劳动力并非易事，稍有不慎，便耽误了农时，面临减产的风险。且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雇佣劳动力的投入便是一笔不小的成本[39]。而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劳动力投入以家庭成员为主，相较于从市场上雇佣的劳动力而言，家庭劳动力具有内在的动力去精细管理粮食作物，充分投入自己的劳动力，从而粮食作物能够得到最为细致的管理，粮食作物的产量有保证。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像小农家庭经营一样能够保证土地产出效率，却因资本的投入而具有比小农家庭经营更为稳定的优势。小农家庭经营一般以家庭劳动力作为主要投入，赚取的是家庭劳动力的变现，其目标不在于追求单纯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是追求家庭整体生活的维持。在粮价保持在平均水平时，小农家庭经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然而，当粮价下跌时，家庭劳动力变现的预期无法实现，小农家庭经营的稳定性不复存在。从而，老人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种植，“中农”退出种植。而资本主义式家

庭农场除了家庭劳动力的投入外，还有可观的资本投入，相应地，其产出也包括两个部分，即劳动力投入的产出与资本投入的产出，且规模经营使得生产成本下降。从而，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比小农家庭经营具有更强的应对粮价下跌的能力。

参 考 文 献

[1] 徐增文．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农业劳动力的流失[J]．中国农村经济，1995（1）：51-53.

[2] 朱启臻，杨汇泉．谁在种地——对农业劳动力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8（1）：164-169.

[3] 陈晓华．现代农业发展与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J]．农业经济问题，2012，33（11）：4-6.

[4] 李旭鸿．“农民荒”引发疑问：明天谁来种地[J]．村委会主任，2012（2）：8-9.

[5] 潘璐．“小农”思潮回顾及其当代论辩[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2）：34-48.

[6] 贺雪峰，印子．“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兼评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6（2）：45-65.

[7] 李江一，秦范．如何破解农地流转的需求困境？——以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例[J]．管理世界，2022，38（2）：84-99.

[8] 杜润生．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9] 宋亚平．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吗?[J]．江汉论坛，2013（4）：5-9.

[10] 董亚珍，鲍海军．家庭农场将成为中国农业微观组织的重要形式[J]．社会科学战线，2009（10）：95-98.

[11] 倪国华，蔡昉．农户究竟需要多大的农地经营规模？——农地经营规模决策图谱研究[J]．经济研究，2015，50（3）：159-171.

[12] 孙新华．我国应选择哪种农业经营主体?[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6）：18-21.

[13] 贺雪峰．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6）：1-6.

[14] 温铁军．21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J]新西部，2001（12）：38-39.

[15] 陈锡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刻不容缓[J]．求是，2013（22）：38-41.

[16] 郭庆海．小农户：属性、类型、经营状态及其与现代农业衔接[J]．农业经济问题，2018（6）：25-37.

[17] 潘石，于洋．中国农业发展理论的传统和现代形式的评析与反思[J]．江汉论坛，2003（9）：5-8.

[18] 陈锡文．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势与问题[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1）：1-10.

[19] 杨华．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J]．农业经济问题，2015，36（9）：19-32.

[20] 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17-137.

[21] 贺雪峰．老人农业：留守村中的“半耕”模式[J]．国家治理，2015（30）：43-48.

[22] 贺雪峰．论中坚农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4）：1-6.

[23] 周宏，王全忠，张倩．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水稻生产效率缺失——基于社会化服务的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14（3）：53-65.

[24] 董欢．农业经营主体分化视角下农机作业服务的发展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6.

[25] 董欢．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分化历史与未来[J]．中州学刊，2017（3）：38-43.

[26] 杨华．“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命题[J]．开放时代，2012（3）：71-87.

[27] 张建雷，曹锦清，阳云云．中农经济的兴起：农业发展的去资本主义化及其机制——基于皖中吴村的调查[J]．中国乡村研究，2016（0）：162-187.

[28] 杨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农经济[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7）：60-73.

[29] 王瑾．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改革与思考[J]．农业经济，2020（10）：118-119.

[30] 夏柱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再认识——基于发展“中农—家庭农场”的思路[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5）：3-9.

[31] 余练，刘洋．流动性家庭农场：中国小农经济的另一种表达[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6）：9-13.

[32] 王振，齐顾波，李凡．我国家庭农场的缘起与发展[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2）：87-95.

[33]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J]．开放时代，2012（3）：10-30.

[34] 陈航英．新型农业主体的兴起与“小农经济”处境的再思考——以皖南河镇为例[J]．开放时代，2015（5）：70-87.

[35] 陈义媛．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以水稻生产为例[J]．开放时代，2013（4）：137-156.

[36] 陈航英．既非小农，也非资本家——当前中国农业

生产中的小资本生产者[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2)：45-55.
[37] 许庆，尹荣梁，章辉. 规模经济、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基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1，46 (3)：59-71，94.
[38] 赵晓峰，刘子扬. “非粮化”还是“趋粮化”：农地经营基本趋势辨析[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 (6)：78-87.
[39] 孙新华. 农业经营主体：类型比较与路径选择——以全员生产效率为中心[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 (12)：59-66.

Falling food prices and "who will farm"——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Y town in Dongting Lake Plain

XIA Jinguo

(*School of Govern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decline of food price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behavior choice of agricultural planters and promote th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n-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the rural society generally formed the structure of "the old-aged agriculture +the middle-farmer agriculture", who were the main agricultural planters. The decline of food price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the old-age and "middle-farmer" who mainly invest in household labor to realize their cashed expectation of labor. The old-age retreat to "ration fields" or even withdraw from planting. "Middle-farmer" withdraw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who will farm" becomes a problem. The capitalist-style family farm which pursues the scale of profit maximization based on the double investment of family labor and capital and has the power of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reproduction takes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over the land from the old-age and "middle-farmer". As a result, the falling food price 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rom "old-age agriculture + middle-farmer agriculture" to capitalist-style family farms.

Keywords: Food price; Old-age agriculture; Middle-farmer agriculture; Capitalist-style family farm;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编辑：武云侠）